

东莞文学年度发展报告： 2011

主 编：田根胜

副主编：胡 磊 许燕转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东莞文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

主 编：田根胜
副主编：胡磊 许燕转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莞文学年度发展报告. 2011 / 田根胜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60-6439-3

I. ①东… II. ①田… III. ①当代文学—地方文学史—研究报告—东莞市—2011 IV. ①I209.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9027号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欧阳衡
封面设计: 海天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三横路11-1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368,000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总报告

文化名城与文学发展：2010 年东莞文学报告	柳冬妩	2
------------------------	-----	---

年度关注

文学中的东莞叙事	胡 磊	22
文化名城：东莞文学的机遇与挑战	许燕转	46
被质疑的“打工文学”及其现状	姜 辉	53
东莞“中国作家村”现象观察	王一丁	67

创作与理论

2010 年：东莞诗歌观察	鹰啄天	82
那些时代的喊魂者——关于东莞的诗人	袁敦卫	90
困境与探索：2010 年东莞作家小说叙事考察	侯平章	100
2010 年东莞青年作家创作情况观察	柳冬妩	106
城市化浪潮中的文化与文学——2010 年东莞文学理论批评	许燕转	112
东莞网络文学之发展及意义	李云龙	118
聚合与眷念：充满希望的东莞儿童文学	黄忠顺 辛丽芳	126

机制与环境

东莞文学新机制的生机与困境	许燕转	138
2010 年东莞电视剧观察	严前海	147

年度东莞文学资料索引

一、2010 年东莞文学活动纪事	156
二、部分东莞作家简介	190
三、“中国作家第一村”作家简介	204
四、东莞文学期刊目录索引	209
《东莞文艺》2010 年总目录	209
《南飞燕》2010 年总目录	226
《南城文艺》2010 年总目录	247
《行吟诗人》2010 年总目录	253
《小不点儿童诗歌报》资料	254
《城市文化评论》2010 年总目录	256
五、2010 年东莞文学艺术著作出版目录	258

■ 总 报 告

ZONG BAO GAO

文化名城与文学发展： 2010 年东莞文学报告

柳冬妩

2010 年对东莞文学而言，是最不平凡的一年。东莞作家王十月荣获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曾小春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东莞在国家级文学奖项上零的突破。王十月、曾小春、方舟、柳冬妩、曾楚桥、穆肃、刘大程、马云洪、却却、吴诗娴、何超群荣获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百定安、柳冬妩荣获广东省首届大沙田诗歌奖。东莞文学在 2010 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十年文化新城建设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为十年文化名城建设拉开了精彩序幕。2001 年，市委、市政府将文化建设纳入全局工作的总体部署，用十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文化新城”。这十年，是东莞文化建设大发展、大丰收的十年。去年 8 月，市委市政府专门部署了文化名城建设，将用十年左右时间，把东莞建设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现代文化产业名城、岭南文化精品名城。回顾、总结文化新城建设的不平凡历史，展望、谋划文化名城未来的发展道路，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学是艺术之母。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历史，特别是文化新城建设与文化名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东莞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背景、发展过程、主要形态展开比较清晰的解读与界定，对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恰当的评价，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初步总结，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新世纪十年，是东莞文学艺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非常时期，其创作实绩之丰厚，创作观念之多元，创作现象之多彩，创作影响之深广，远甚于以往任何时期。文学从本质上回到了艺术和审美自身，成为一种植根于生活的自由创造和真诚的精神言说，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化内涵和艺术质感，被放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并获得了充分的展现；文学艺术交流空前频繁和自由，东莞作家的艺术视野和艺术资源日趋开阔与丰邃；文学创作繁复而火爆，不同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包括不同载体和类型的文学作品，争妍斗艳，竞相展示，审美个性受到尊重，艺术探索获得鼓励，流派或群体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现象不断呈现，若干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层次。这一切使东莞文学在 2010 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起点。本文以新世纪十年为背景，对东莞文学的 2010 年发展作一个简要盘点。

—

2010 年是东莞小说创作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年，不仅为东莞文学创作，也为东莞整个文化发展树立了标杆。王十月、曾小春的小说荣获国家级大奖，标志着东莞的小说

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东莞的小说创作不管在确立本土的小说格局方面，还是在与外部交融并为中国小说整体创作作出贡献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东莞是一个在文化上有着深厚底蕴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移民城市，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莞小说创作者的言说方式、精神走向和内在抵进的能力。也正是这些特点使东莞的小说创作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小说创作，而呈现其独特性和不可或缺性。可以这样说，东莞小说在2010完成了从功利性创作到关照小说本身的转变，完成了从不自信的摸索、对外倾慕到自信、自立的转变，并在这基础上让小说创作呈现出被本土命运召唤的深刻性。毫不夸张地说，拿小说创作回应文学对本真要求的这个尺度来衡量，东莞的小说家以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文学色彩来完成了东莞小说总体格局的建构。

2010年，东莞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荣获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评委会认为，“作为一位从工人中走出来的作家，王十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中不同身份人们的复杂境遇有着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他的《国家订单》在危机与生存的紧张叙述中烛照人心，求证个体的权利、梦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公正、准确地把握时代生活的能力。”《国家订单》最初发表于2008年第4期《人民文学》头条，同期发表的还有阿来的《空山》第六卷、王安忆的《黑弄堂》，但这期卷首语《留言》，谈论的对象仅限于王十月和他的《国家订单》，可见编者对这篇小说的偏爱。发表后不久，《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选刊几乎同时转载，《2008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长江社版）、《2008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谢有顺选编，花城社版）、《2008小说月报精品选》（小说月报编辑部选编，百花社版）、《2008中篇小说选》（小说选刊编辑部选编，漓江社版）等选本也不约而同地收入，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大多数人认为，与以往的“打工小说”相比，《国家订单》的叙事视角有了新变化，故事的讲述者从打工者转换成小老板，叙事方式的转变引发叙事伦理的变化，小说似乎透露出劳资双方意图和解、分享艰难的意味。少数人则批评，它以“打工文学”的名义背叛打工者的阶级意识，为文学界接受并高度评价，但它只是顺应了当下的文坛与新意识形态，在美学与历史中并没有足够的突破及新因素。这两种阐释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把小说的基础看做是一种阶级意识，而不是一种探询。从“打工小说”的角度看，《国家订单》似乎犯了忌，但却从更深意义上开拓了“打工小说”的本质领域，使小说之剑更加锋利地直逼存在。我认为，《国家订单》最为成功之处，是王十月对车衣工张怀恩过劳死的叙述，发出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所有情节其实都是对张怀恩之死的探询：以做来料加工而白手起家的“小老板”因为香港贸易商赖查理的货款收不回，无钱订购原材料、无钱给工人发放拖欠了四个多月的工资而众叛亲离，工厂濒临倒闭。树倒猢狲散，大家想的都是各奔前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老板心急如焚，既要一天无数次地联系港商救星赖查理，又要心平气和地接待一批批讨薪工人。恰好这时，美国发生了“9·11事件”，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悬挂国旗。赖查理向小老板下了一批美国的国旗订单，要求小老板在五天之内生20万面美国国旗。为了按时交货，小老板不得不逼着工人加班，五天五夜只睡四个

小时。国旗终于按期交货，小老板也履行诺言，带着工人到海边去游玩。此时，却发现新提拔的车间主任张怀恩，因连续加班累死在了车间的碎布料堆里。如果没有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弱势者基本人权”为名头的律师周诚的出现，小老板用八万元即可平息掉“死亡事件”。周诚却以八十万元索赔把小老板逼上了破产的绝境。当小老板如“跳楼讨薪”的民工一样爬到高高的高压线铁架反思时，赖查理又兴奋不已地以“国家订单”为由头，再次急电他在两天内赶做十万面美国国旗……张怀恩之死对小说叙述的意义，不仅在于制造了情节的戏剧性，而且在意蕴层面将各方利益主体整合在一起，集中显现了人的处境、存在的状况和生命价值等问题。死亡是对生命价值的尖锐提示，提示了人的存在困境。死亡展示了人性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性、生存的复杂性。小说借助死亡这一生动的生命事件逼近了“人”的真实面目，使我们有机会认识像小老板和张怀恩这样的类型人物。当本义的死亡降临具体的生命个体时，死亡叙事中体现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主题也就显现出来。同时，人的正负两面也分明地展现出来，个体的存在状况和日常经验得以还原。《国家订单》对张怀恩过劳死的叙述，从主题意义上说，集中体现了生存、生命和人性的各种价值，体现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属性。谁为张怀恩的死亡负责？追究个体生命的死亡问题，探讨个体生命价值、个体生存危机等存在问题和人性问题，是我们解读这篇小说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张怀恩之死，面临着社会文化立场、道德感和法治意识的责问，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存在的震撼。

2010年，曾小春的《公元前的桃花》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公元前的桃花》共收录了18篇曾小春的儿童小说，包括《父亲的城》、《西去的铃铛》、《水字兰亭序》、《手掌阳光》等。这些作品特别注重少年儿童心灵的刻画与挖掘。其中部分作品入选各种儿童文学年度选本，不少作品被《青年文摘》、《中国儿童文学》转载。《公元前的桃花》是一部文笔精粹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以孩子的眼睛，观察古老而又充满变化的乡村社会，同时刻画此中亘古未变的复杂的人性人情。这里既有延续千年的悲辛欢乐，也有渐被世人忘却的动人的赤子之心。对于古老乡村生活的怀念和敬畏，构成了这部短篇集深厚的文学意蕴。曾小春自198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空屋》以来，一直从事儿童短篇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说集《父亲的城》、《送你一匹马影》、《公元前的桃花》、《哑树》，长篇小说《蓝色故乡》、《手掌阳光》等，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江西省谷雨文学奖、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儿童文学》第四届小说擂台赛银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全国优秀少年小说选”、“建国五十周年儿童文学名作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儿童文学选”、“中国儿童文学年度作品选”等多种选本。曾小春坦言，他许多作品中的背景和人物都来自童年生活。早年在江西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他的作品萦绕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家笔下那些丰富鲜活的生活场景，清新浪漫的田园风光，淳朴善良的乡村伙伴，温情宽容的民风民俗共同构筑了一段伴随着牧歌旋律的集体记忆。对于童年经验的还原，使作家回味着那些沉淀在记忆中的道德理想，重情义轻功利的诗意人格。对于童年经验的想象让作家用理想的情怀和诗意的笔触营造出了一个植根于乡村的精神家园。这个用想象营造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其外在形式指向过去，但深层意蕴则指

向未来，是作家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种哲学思考。

夏阳被称为国内小小说创作的一匹“黑马”，荣获了国内小小说最高奖——金麻雀奖。全国写小小说的，可谓成千上万。夏阳就是其中一个。不同的是，他一出现，就引起了小小说界的广泛关注。做过算命先生的夏阳，在小小说界里最会算命。在他的作品里，布满对命运的占卜、窥探和拷问，对人性的呈现与思考，无论是立意、语言，还是叙述的角度，都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宽广的艺术视野。在《寻找花木兰》中，夏阳把花木兰的命运写得跌宕起伏。当年在海口，花木兰赤手把三个流氓打得满地找牙，时隔多年，面对流氓的挑衅，她变得忍气吞声。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威力，它可以把一个人的锐气慢慢磨掉。后来，花木兰终于大打出手了。这让我们看到了“花木兰”的回归。可夏阳在结尾的处理是：花木兰为了躲避麻烦而连夜搬走，这不能不说是夏阳的独特高明之处。事实上，小小说写作之所以讲究技巧，亦是对作者智力开发提出的极大考验。谁都会说故事，问题是，故事要出色，更多地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冷静探究。夏阳的《一双红绣鞋》，开始了一场内心窥视之旅。作者以一双红绣鞋的身份进行叙述、旁观，无言中进入了主人的内心，也就注定文本的审阅性和深刻性到达一定的高度。压在箱底60年的红绣鞋，在短暂的光明之途后，却要经历“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的境遇，特别是“贵哥，你就当我死了吧”一句，更是把爱情的凄美刻画得淋漓尽致。在爱情和金钱面前，到底哪一样更强大？答案是不问可知的。假如说《寻找花木兰》、《一双红绣鞋》等精品力作是对生活、人性的直接呈现，那么，《捕鱼者说》则更为复杂，也伸向了更深刻的主题：命运。两代人的命运，都与一条叫夏阳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夏阳河干了，“水上飘”死了。而摆在泉林和秀珍眼前的，是茫然而无法预知的命运，尽管他们以为找到了“到南方打工”这条出路。这篇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在命运面前，或许，只有憧憬和温情才能救赎自己。在同样具有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聪明含量的条件下，节省阅读时间就是对读者的最大尊重，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一次哪怕是简单的欢快，也令小小说写作者们乐此不疲。夏阳的小小说文笔流畅，感情丰沛，可读性强，注重人性的探寻，能在平静的叙述中，以洞穿世事的目光，一层层揭示着生活中的部分隐秘。

詹谷丰的小说《菩提的根》被《小说月报》转载，并荣获作品杂志社举办的全国打工文学大奖赛二等奖。著名评论家段崇轩先生说：“底层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塑造底层人物形象，但多年来成功的人物形象却很少。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成果。先看老一代人物形象。詹谷丰《菩提的根》中的农民乔树根，挤夹、困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孤身一人的他，跟着在广东打工的两个儿子，既能干点杂活赚钱，又有所依靠，活得其实很轻松。但他却时时牵挂着他的土地、他的老屋还有那两棵菩提树。他终于下决心回到村里，但村子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他被埋葬在倒塌的老屋中。小说强烈地表现了当下农民的尴尬生存与无根状态，刻画了一个善良、勤劳、执著、重情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东莞时报社文化记者朱桂英评价道：“小说以现实的笔法，充满隐喻的故事构架，以及对生命与生活的敬畏，直面现代化冲击下的乡土社会。字里行间游走着理性的冷峻，蕴纳着古典的同情

与悲悯，深沉浑厚，引人深思。”^{〔1〕}除了詹谷丰的小说外，2010年东莞作家还发表一大批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黄运生的《地塘岭笔记》，“小说情节不蔓不枝，干净简洁，对底层小民的凡庸人生进行慈悲的关照，在喧嚣中引入诗意，于荒诞处注入温情，切入现实，直抵人性。”邹萍的《家属大院的张艳华》，“温和典雅的语言，安静内敛的叙事，柔美中有人性的坚守，温润中有细微的精神审视，简单的意象，却承载了复杂的寓意，延宕出丰富的生命景观。”陶青林的《刀锋上的鱼水》，“以强劲的叙事冲击力，有力镂刻了打工者的心理——自我救赎的无力，精神焦虑的颓败，破碎悲情的爱与欲，充满了绝望与挣扎，正是辛苦恹恹的生活一部分，自有一番惊心动魄。”曾楚桥的《余生》，“用简单的故事，挑起厚重的人生。现实的冲突、内心的较量、世俗的挣扎，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中，次第展开，倾注了作者对人性的体悟，充满哲思与人文情怀”。曾明了的《突然之间》，“在结实而饱满的叙述中，细腻生动地描绘着情感与青春的纠缠，构思精妙，笔触柔和，摇曳生姿”。

二

翻读2010年度东莞散文作品，令人欣慰：东莞的散文创作依然是高产多产、广袤丰富的。自然地理，山水风物，人文历史，生活生命，人生人性，时代现实，亲情友情，无所不包。这高产多产和广袤丰富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散文发展的一些脉络，可以明显感受到东莞散文创作向生命的回归。东莞散文作家有意识地穿越生活的表面浮影，努力潜身生命河流的深处，感受生命内在的搏动。

塞壬的《匿名者》（《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很像一部个人历史的供词。在《匿名者》中，塞壬书写了自己在广东九年的漂泊匿名生活，书写了那些匿名在城市中的人，“九年的匿名流浪生涯顽癖一般的真实，它混乱、落魄、阴郁、压抑还有疯狂，被厄运追赶，在困境中沉浮”。“2009年，我结束了在广东九年的漂泊生涯，一个叫塞壬的写作者，她是这段匿名生活的终结者。……我填写了一张东莞图书馆的入职表。但这次，我填写了真实的姓名、出身地、年龄以及最简洁干净的经历。我一笔一画地写着，饱蘸着力量，仿佛要把字刻在纸上一样，永不再改变。面对自身的真相，我竟然感到茫然，太陌生了，陌生到可疑。这得要追溯到多少年前啊，眼前定格在表格上的这个人——黄红艳，她已消失了多年。”“成为城市的匿名者，我们别无选择。”“篡改的名字，伪造的经历，被切割的时光，频繁地迁徙，生活的碎片被扔在各个城市的角落。”塞壬写出了滚滚时代潮对个人命运的裹挟，凸显了时世荒诞与残酷的一面，透露出对匿名者生存状态的无限悲悯，或者说它是深情凝视草民、以个体的存在验证这个时代的作品。灵与肉的挣扎与救赎始终在进行，这表明，肉身的沉重和精神的律条始终伴着我们前行——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体征，是命运的归宿。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对于个体价值生命意义的寻觅与探求中，在愤懑于历史惯性、现实环境对于个性的压抑时，匿名者“躲闪的目光、虚张的言辞总会暴露出某种狡狴的特质，以

〔1〕 朱桂英《争妍斗艳繁花满枝》，《东莞时报》，2010年12月26日。

及永远给人的不确定感。他们没有浑然天成的从容，那是因为：他们有着真正的畏惧、恐慌以及无法预知的生活所带来的焦虑。”散文写“我”的九年匿名生涯，这既是一种历史叙述，也是个人命运的变迁史。在“小叙事”中隐含着“大叙事”。通过一个人命运的“沉浮”，表达了世道人心、人情冷暖，自己那颗感悟到艺术、美和理想的心灵在这个社会里感到污浊而窒息。塞壬的身上有着旁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内心风暴，但这纯粹是个人的、身体的，她不断地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她的写作背后深藏着一颗悲哀的内心，她不知道内心的苍凉从何而来，但她确实如此真实地触摸到内心的苍凉。当身边的匿名者不断地离开、出走或陷入无望的混乱，面对紧箍的体制与既定的秩序，她有过不满、怀疑、痛苦、失望与沮丧，毅然以散文为媒介对世界进行最全面的、最直接的介入与反抗，直至走向激愤与绝望。她的散文《匿名者》是对“匿名者”的深刻命名。主要探讨历史精神或宏大叙事里面的个人状况。人是怎样在历史叙事里面被归类、被整合，归类整合到“匿名”，发挥对人性的双重摧残、压抑和扭曲。她把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缝合，深感真相的隐匿才是更内在的现世危机，而个人常被生活大潮卷着走的无力感，又说出现代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困境。正是在这种沉痛、矛盾和紧张感中，塞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匿名者”，质问生命的终极存在，以独立的方式思考着“匿名者”在一个荒谬时代的命运，在个人的小历史中来认识生活 and 自我，来探询历史、文化、人性的意义。塞壬喜欢在散文中探讨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生存境遇等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关注与反思时代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精神问题。塞壬一直在深刻地思考现时代的人的命运，关切我们生活正在丧失的价值，她的书写既是一种绝望，也是一种拒绝和坚守。面对异化的社会，她一直保持对本真存在状态的追求，一直在反抗不确定的命运。与人生的荒诞性作对抗，她用自己的反抗证明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存在。

在盛产“文学活动家”的东莞，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作家老马（马云洪）反而被遮蔽了。就实力而言，他的小说、散文俱佳，尤其是他的散文文本，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追寻与扣问，老到而新锐，高蹈而真实，具体而丰满，冷峻而内里温热。但由于种种原因或者作家心性，老马的写作显然没有受到业界足够的重视，推介更是寥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被遮蔽的嫌疑。老马大概可以算得上东莞最孤独的作家。然而正是这样的孤独成全了老马的写作。老马伏枥，志在千里。较之当下文坛的浮躁和虚饰，老马的写作是扎实的和有根的，呈现出安静若虚、大巧若拙的艺术气象。他以沙漠烽燧一样的定力和傲骨，进行自我的、与众不同的和卓有成效的写作。只有写作才能证明老马的存在。在长篇散文《四季老屋》里，老马依着大自然对时序的安排，描述着屋前屋后的动物植物，对他曾生活过的老屋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回顾，“深入它的内部，解析着它的内部结构，破译它已有的和未知的秘密”，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心智的浑然状态，字里行间具有冷静的观察、一心一意的体悟和充满激情的卷入。面对天穹下肃然而孤立的老屋，老马的文字像“一群鸟从它的上空飞过，惊颤惶恐地，它们触到天空的痛处和人类的悲伤”。不可言喻的感受便是由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洞察混和而成。“草木和着人一生的节拍，由懵懂无知到热烈奔放青春毕露，由宁静安详到波澜不惊，以至于凋零于尘土，循环往复，自然和人类都无法改变”。散文中“一些人，一些

事,一些物象,一些童谣俚语电影镜头一样地隐退”,这是对意识的震颤,是对精神高度和深度的全部敞开和生动记录。一些动植物的尸骸也鲜明地活在他的心灵内外,有的已经进化为精神性的。他描述:“一条年轻的青花蛇死于它和女朋友约会的路上。……它死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它死得其所。”在老马的散文里,精神仍旧煎熬于某种应答性,面对肉身易朽、现实的贬损力量及死亡的消解力量,老马异常敏感,他处心积虑地抗拒着时间对精神的霸权。老屋虽然为泥土青瓦所建,但在马云洪的散文里,它却通向了一种无限的所在。在《四季老屋》里,他所观察到的大量生态细节,最后都汇合到更为广阔的时间背景与视野中获得它们的秩序。老马还有一类历史文化散文,直接阐述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独特感悟,手法大气磅礴、纵横捭阖,使这些历史人物肖像清晰、鲜活地跃然纸上。《守望忠义》写的是余家子孙恪守祖训为袁崇焕守墓达十七代的义举,“这一脉连绵几百年的感情注定要成为民族精神最为华彩最为凄艳的一段历史索引”。老马用自己的情怀“体会到守墓人所拥有的精神情怀”,激活了“长达三百七十二年的时间里守墓人的历史”。它以袁崇焕墓园为圆心,辐射文思与笔墨,既有回望昨天的沉思,又有面对遗迹的感悟,所有这些整合于一体,化为万象辐辏的艺术景观,把散文表述历史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另一篇散文《一杯净土惠山丘》中,有心叩问历史真谛的老马,在回望和探照瞎子阿炳的前尘旧影时,让笔墨在保持简约的背景勾勒的基础上,更多地集中于人物的内心世界,致力于人物的精神揭秘,这使得他笔下的散文顿时浮现出生命史和心灵史的意味。这篇散文像阿炳的《二泉映月》一样,触及了世人心灵最深处的忧伤,触摸了世人心灵最柔软的痛。沿着作家或剥茧抽丝、或见微知著的艺术叙事,我们领略了阿炳依靠一把胡琴拉出的曲调打开了一个由日本士兵把守的城门,这一匪夷所思而又入情入理的另一真实。这篇散文对日本士兵倾听瞎子阿炳时的全部感觉和体验,进行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和鞭辟入里的书写,着力揭示日本士兵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有意识地强化感性渗透乃至生命体验,对人物展开大胆、深入而又新颖、细致的心理分析。这时,通篇作品便平添了人性和感情的元素,甚至有了触觉,有了体温,其字里行间便充盈着一种既源于创作主体,又来自人物精神的生命活力,一种既毛茸茸,又热辣辣的东西,它不仅使阿炳也使头戴钢盔的日本士兵也变得有形有神,有血有肉,让蒙尘的细节熠熠闪光,营造出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在不经意之间,完成对心灵和读者的带领和敞开。

实力派作家曾明山去年出版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江南》,这是东莞散文创作的新收获。乡土大地,一直是中国文人抚慰精神创伤、寄寓苦闷情怀的精神避难所。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文明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围剿我们的乡土,侵蚀淳朴的民风,浑浊清远明朗的天空。昔日的精神避难所,蜕变成了一个难以言说的痛楚所在。这一点,对从“长江荆楚段南岸的一个小村”迁移到“世界工厂”东莞的曾明山来说,有着比其他作家更为深切的体察。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城市,目光一触及曾明山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江南》,巨大的反差,让惊、麻、疼、喜瞬间交织一起。“文字总是和哺育自己的水土有关。”曾明山所说的江南,不是江浙的江南,是荆楚大地的江南。他在序中说:“我习惯将我的故乡称为江南。”在这本散文集里,曾明山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日渐消失的乡村世界。曾明山怀乡的时候意识到了乡土的意义,他把乡村

记忆与江南的审视变为一种美学的关照，在那些平凡的日子和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存在。曾明山满腹情趣地描绘了童年及青少年成长岁月的生活图景，“回忆故乡和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童年的那些最深刻的记忆，那些最先进入生命意识的深刻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曾明山打捞上来。结绳、打谷、渔猎、偷桃、牛事、拾漏、采花、闹架、游戏、过年……曾明山编织草绳般地将点滴往事串起，把对童年的眷恋、对岁月的感悟、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化作笔下传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圣洁文字，真实、完美而自成系统。曾明山为我们记录下的童年感受，并没有在岁月的流逝中失却它往昔的迷人风采，今日读来仍对我们产生强大的感染力。乡土里不仅生长供我们吃喝的粮食，也生长我们日益稀缺的淳朴、原始、真实、美好、感动甚至落后。对乡土深深的热爱，对故乡风俗人情的熟悉与眷恋，对父老乡亲的爱戴与感激，对山水草木的观察与体验，构成了《一个人的江南》的主要内容。虽然偏远贫穷落后，但作家的记忆与许多天真无邪的童年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快活与乐趣，整个小村就是一个忘不了的小伙伴，这样的写法不仅新鲜简洁而且独特感人，透出了作家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与感恩之情。曾明山的写作比一般乡土散文更有感悟，更具灵性，也更深挚。也许是农家孩子艰难生活的早熟，也许是独特的成长经历养练了他凝神视听的本领，《拾漏记》中，地里头遗漏的黄豆和稻穗，在其笔下是那么熟悉、贴切，并感觉温馨，平添了一份枯涩和情趣。母亲为鼓励孩子去拾漏，承诺用“五毛钱一斤来收购”，“五毛钱对我和哥哥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想象着一段时间以后，将有几元钱让我据为己有，拥有属于自己人生的第一笔财富，心里就充满了憧憬”。只有那些真实感动于劳作而且认同劳作价值，并以劳作为荣的乡土之子才会有如此的感觉。曾明山对故乡的爱溢于言表，他对故乡的乡土风物、山庄草木、四季嬗递一往情深，对故乡的某些风物如长江柳等情有独钟。“湘北的荷花、香芷、桂树、木兰、辛夷等植物，是洞庭湖区特有的景观，行吟其中，周身也氤氲着一种迷离的气息”。湘北乡间流传的许多风土民习，更使曾明山每一回忆便无限倾心。“那是一种亲近泥土的感觉，一种非常质朴的感情。”《水塘小记》、《瘦水》等篇什，几乎每一篇都极具江南风韵，构筑了一个个斑斓多姿的“乡村意境”和“乡土氛围”，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相交织的优美字句中，糅合了自然美和生活美，使执著与超脱、浪漫与现实、具体与抽象得到完美的统一。《大泽地人家》、《南湖探幽》等散文达到一种空灵、澄明、清澈、旷大，甚至接近虚无透明的“大乡土境界”。即使是对故乡山川景色、田园风光的单纯描绘，由于写出了故乡特有的地域风貌与风土人情而饱蘸了作家的浓浓乡情。对于曾明山来说，“江南”是一个既温暖而又疼痛的主题。在第三辑《我的湘里乡亲》中，其回忆之作带有明显的凄苦、悲凉色彩。但我们依然能在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家乡美好未来的期待与憧憬，感受到出现在灰暗“底色”上的令人鼓舞的明朗色彩。知道曾明山的经历就理解了他一定会写出这些文字。曾明山写父母的两篇散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文《一个文人》写出了父亲的苦难命运，字里行间除了痛还是痛，人世间的苦难有的时候多于幸福，这是命运。因此写出的好散文，亦是命运。父亲一生与困苦相随，后半生与疾病相抗争。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境况的一个映射”。曾明山的这篇散文让人读出了

感慨和感叹，读出了深厚，读出了久远。有人说曾明山写的是乡土散文，其实不完全是，他写父亲的这篇散文，不是“乡土”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在散文里，曾明山也长于作形而上的思考，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思考命运的终极，思考思考本身。他揭示想象，描绘人生，追问生死的两极，寻找灵魂的出路，散文中透出一股深沉的痛感，悲悯而宽厚。他的散文里，充满了对生命的内在性的拷问与追索，对时间流逝的叹惋，对个体生命的玄学凝视和深刻关怀。缅怀湘里乡亲，回忆乡土往事，正是作家寻找家园的外在体现，“表达的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逝去的乡村生活的深切怀念和自省”。江南是曾明山生命中的原风景，“是铭刻在心中的文化符号”。曾明山的江南是具体而抽象，美丽而忧伤的。它满蕴苦涩而温馨的往事，载负着遥远而亲切的回忆，弥漫着熟悉而惆怅的氛围，是一个人的江南，又是众人的江南。在曾明山笔下，江南有着“母亲”般的包容性，它不仅是幼年成长的记忆，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漂泊已久的游子灵魂皈依之所，对抗城市钢筋水泥的单调色彩带给人们心灵的压抑，来抚慰都市的喧嚣和纷争带给心灵的伤痕，在不经意中，曾明山完成了一个都市心灵的自我救赎。

青年作家、诗人林汉筠出版了散文集《百年听风》，肖复兴先生在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林先生并不是凤岗本地人，远从湘地而来，却并非独在异乡为异客，而是以主人公的姿态，对凤岗一往情深，对凤岗雕楼如此下了工夫，以笔运斤，不仅对那些雕楼一一造访，而且尽力采访尚存的当事人，追寻往昔，钩沉历史，梳理雕楼的来龙去脉，为凤岗雕楼写史作传。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人的一种文化自觉，我对这样的文化人和他们所书写的文字，一直都怀有敬意。一般而言，到了新世纪之初，文学属于散文。这在上一个世纪之初，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来这样的眉目，所以鲁迅先生说过那个时期的小品文的成功是在诗歌和小说之上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特殊的现象称为散文时代所属，这样散文时代出现的背景依赖于世纪之末的王纲解体。旧的体制、旧的价值体系、旧的精神寄托，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被冲撞、被颠覆、被解构，而新的一切正在创建却一时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切便只是碎片，是散文的‘散’。自然，散文最生正逢时，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散文时代，不是英雄的时代，却是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时代，是众神喧哗的时代，是以任何人都可以写为标志的民主化进程的时代。林汉筠先生的这本散文集《百年听风》，在这样的时代应运而生，却不是那种为文而文的散文，不是那种自怜自恋风花雪月的小资文本，也不是那种只为唬人大而无当的所谓大散文的文本，而是有着一份即使微薄也属于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着自己钟情的一亩三分地的深耕细作；在彻底碎片式的散文之散的创作背景中，他有自己的努力和追求。这个一亩三分地，就是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凤岗，而且他把目光更集中在凤岗的雕楼；这个努力和追求，就是他把凤岗雕楼当成一种象征，一段历史。在这本散文集中，便有了散文没有完全失去散落的魂，有了他心底的一种心愿和情愫，才能够保持那样长久的热情和恒心，横刀策马一展身手，把一腔忧思和情怀融入进凤岗的雕楼之中。看他书写的这些雕楼：张潭楼、家俊楼、达齐楼、嘉华楼、土宜楼、红星楼、文楷楼、端风楼、义业楼、其章楼、汉章楼、雁田楼……还有历史最悠久的玉堂楼，

历史最牛的冠英楼，凤岗出来的象棋大师杨官璘下第一场棋的杨屋楼，以及兄弟楼、连体楼……他都不满足于雕楼仅仅是光宗耀祖和防御匪寇的原始功能，力求以历史的眼光、文化的角度和感情的纬度，写出它们各自生动而深沉的生命史。那些雕楼所蕴含的岁月沧桑和情感元素，以及变迁的历史，是他所着重描摹的。于是，在这些雕楼中，才赋予了对亲人、对乡里、对民族的炽烈而浓厚的情感。无论是在清末民初国家危难先辈的“过番”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困难之中乡亲的逃港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抑或是在今天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时期，他都尽力将雕楼放在这样大的跌宕的历史背景中去勾勒，去书写，而不仅仅把它们单摆浮搁写成到此一游的旅游说明书。在写法上，他有意变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可以看出他求新谋变的意图，但我以为这些并不是重要的，而且有时用力过重，多少有伤文风的统一。在我看来，写得更好，也更为亲切、自然的，还是第一人称的那些篇章，他不拘泥于特定历史场景和人物的揣摩，而是将现实与历史，将自己的心情与眼前的情景交融一起，在对历史、乡土、和民间的对话中，更为灵动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和感喟。”

三

一大批才华卓著的东莞诗人，在2010年度为东莞诗歌添加了颇为绚丽夺目的艺术光芒，构建了东莞诗歌自身的艺术声誉。诗歌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成长史。18世纪后期始于英国并向欧美大陆进而向世界各地蔓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成为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等作家关注的焦点和想象的来源。作为世界之都的巴黎，它吸引着法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文学家，多少世纪以来它都出现在文学、艺术家的回忆录和旅行书简中。在19、20世纪“巴黎文学”空前繁盛的时期，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波德莱尔、兰波等作家诗人，都写下了以巴黎生活为中心的鸿篇巨制，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同样在21世纪初，我们也看到了东莞作为一个特殊城市与诗歌的相互关系。作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最集中的体现者之一，东莞也是最能激发诗人想象力、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东莞是一个全新的城市空间，为文学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中国迅猛推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东莞萌生和造就了一种青春时期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新的城市精神。诗歌保存并拯救了人对城市的复杂体验。

2010年，方舟在《花城》发表了《制鞋少女》等诗歌，《制鞋少女》是书写社会疾病的力作。“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作为思想者，作者苏珊·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身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现实世界对自由的压禁，对身体无所不在的侵扰占领，诗人尤其是“打工诗人”在“疾病的隐喻”上作出了或悲沉、或愤怒、或怀疑的反应。

一种不明气体/在制鞋车间里弥漫//这是春天/春天不会倒下也不会撤离/春天里的叶子只会在/一种风里轻轻地颤抖/就像大多数人的幸福和爱情/只含蓄地传递给亲密的肢体/在语言触摸不到的地方/轻快地发出它的声音//这种声音多么内在/但它和制鞋少女无关/制鞋的少女/她们的身体/是一厢厢统一编码的工衣或鞋坯/登记,归类,封闭,重复使用//就像人事部经理说不出她们的名字/她们说不出工业区鞋厂太多的隐秘//一种不明的气体/正穿过少女的身体//电视广告插播——/一双放大的鞋/在没有极限的大地上奔跑/时报广场/一字排开的精品鞋店/人们讨论时尚、诗意、美以及信念//手掌上的鞋/手掌上留下青春腐蚀的细节/一种被证明有毒的气体/继续在青春的车间里蔓延//新闻转播:/一位离厂的少女倒在贫穷的乡间/她的工业生涯是一张可疑的病历/另一群制鞋少女/在禁止说话的车间里想象春天//一双鞋,一千双鞋,无数双鞋/在我们身边的时代里奔跑/它深度击打的声音/叫着前进//——它绕过了春天的叶子/和少女的身体(方舟《制鞋少女》)

从方舟对制鞋少女感人的抒写里,我们看到诗人对底层生存的关怀、对劳动者境遇的悲悯和对身体尊严的捍卫。《制鞋少女》中电视新闻画片、想象的制作车间、名牌鞋的广告解读、乡间无钱治病的病中少女、时尚店等场景的转换和穿插都是意在增加作品的层次,让制鞋少女的身体包涵更多的具有某些悖论意味的时代信息,让我们看到身体所处的真实现场、处境和命运。“她们的身体/是一厢厢统一编码的工衣或鞋坯/登记,归类,封闭,重复使用”。身体具有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生产了社会现实,生产了历史,身体的生产就是社会生产。打工者的身体“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老板的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郑小琼《流水线》)。曾经当过打磨工的“打工诗人”黄吉文在《打磨工》一诗中力图转化身体的苦难,力图把“旋转的车间轰鸣的机器/合演一场工业的颤音”而在幻觉中把自己当成“民间乐队”。可是,一面是火花、火焰,一面是脸孔和内心的黑暗。“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却不能镀亮内心的黑暗”。不论是书写制鞋少女的身体,还是书写打磨工的身体,在这些诗篇中,我们都能发现每首诗都有被压抑下来的心事,被延误的幸福,落空的期待。生活留给他们的是“一片咳嗽跌落的声音/比噪音重比尘埃轻/叫嚣的烟尘/顺着一脉呼吸遁入肺叶/沉淀成我们多年后的病痛”,是迷失在蛮横的生产方式中的冰凉身体。仔细看看的话,这一切与资本的流动品格有关,与资本更多地把市场风险留给劳动者的诡计有关,尤其权力已完全站在资本一边。它们稳固的结合把风险与难题全部留给了无力承受也只能承受的打工者的身体。他们的身体如尘埃一样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分裂、丧失。

作为东莞标志性的诗人,郑小琼的诗视野开阔,气势磅礴,极具思想艺术层面的冲击力,透着来自大地内部的隐忍、负重与颤栗。2010年,郑小琼创作了女工系列组诗,引起广泛关注。梅洛·庞蒂的“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似乎成为当下时代境遇最为恰切的象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伤病的时代。这些充满伤病的身体并非不可避免。它们需要得到矫正和干预。任何一种疾病都同其他的疾病相关